

第一部分 迈向社会实践理论： 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和逻辑

华康德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

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札记》

在过去 30 年里 皮埃尔·布迪厄撰写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已经跻身于战后时代最具想象力和最富成果的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之列。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潜伏期后，其影响迅速上升，并稳定地扩展到许多学科中，从人类学、社会学、教育研究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从地域上看，这些著作的影响从法国的欧陆邻国扩展到东欧、斯堪的那维亚、亚洲、拉美和美国。^①布迪厄的著作 包含了百科全书式的内容^② 完全不拘泥于学科的界限 兼及非常广泛的专业化研究领域（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缘群体、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居住状况、知识分子以及国家的分析）并且能够将许多不同的社会学体裁揉合在一起（从细致入微的人类学 描述到统计模型、再到抽象的元理论和哲学论述），所有这些都从许多方面对社会科学现行的学科分工和已被接受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

不过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布迪厄的整个工作之所以如此不拘一格，正在于他始终孜孜以求，力图超越某些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包括看起来无

① 在欧洲大陆，ethnography 一词的涵义与英美的 anthropology 一词的涵义十分相近，在本书中，作者一直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因此我们一律译作“人类学”。——译注

法解决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间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长期脱节（Bourdieu 1973c, 1977a, 1990a）。而且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布迪厄通过逐渐摸索出一套能够消解上述二元对立的工具和方法论手段，逐步抛弃了另外两个近年来占据理论讨论中心舞台的二元对立，一个是结构与能动作用（structure and agency）的对立，另一个则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³⁾布迪厄不为变幻莫测的学术时尚所动，坚定地认为有可能建构起一门有关实践——特别是有关符号权力——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unified political economy of practice）。这种政治经济学可以有效地将现象学的分析角度和结构性的分析角度结合成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既在认识论上做到逻辑贯通，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即一门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但同时，布迪厄的理论又是独具特色的，因为它明确地将那些对他人实践进行理论说明的分析者的活动也纳入了它的范围之内（Bourdieu 1982a 和 1988a）。

不过颇为矛盾的是，这一成果虽然在范围和内容上都十分广泛和系统，但却明显是以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被理解和接纳的。加纳姆和威廉姆斯（Garnham and Williams 1980 :209）曾提请人们注意，“对一个内容丰富、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和跨越许多领域的相关经验研究，如果采取零碎片面的方式加以吸收……那只会导致对该理论的严重的误读”。他们的告诫现在看来颇有先见之明。如果说布迪厄理论中一些被挑选出来的概念（例如文化资本的概念）已经被那些在特定的经验研究和理论领域工作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所广泛使用，并且已经产生了颇为丰硕的成果⁽⁴⁾，那么布迪厄的著述作为一个整体仍在被广泛地

误解，而且它的整个体系和内在理路仍然有待澄清。它所引发的各种解释杂芜不清，评论彼此对立，反应矛盾不一。这些都证明：布迪厄理论从欧洲大陆向英语世界的传播过程乃是对他的理论作零敲碎打的运用和断章取义的理解的过程。

因此，简而言之，英语世界对布迪厄著作的吸收，迄今为止一直是围绕三个主要环节进行的，每一个环节都相应地以他的一部主要著作作为支撑。^[5]研究教育问题的专家讨论的对象总是《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 人类学家关注的则是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研究以及《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Bourdieu 1977a) 一书所包含的对惯习 *habitus* 和符号资本理论的论述 而研究文化、审美、阶级的社会学家则盯住《区隔》(Distinction, Bourdieu 1984a) 一书不放。每一群解释者都显然忽视了其他解释者的关注或布迪厄关于其他问题的研究，以致几乎没有人能够识别出可以将布迪厄对上述每一领域的研究和他对其他领域的广泛研究联系起来的理论逻辑与具体内容的有机关联。结果是，尽管近来匆忙翻译了布迪厄的许多著作，而且围绕他的作品已经产生了大量二手文献（并且其数量还在迅速增长），但对布迪厄思想的理解仍然存在许多疑点。

在对本书主体进行导读的第一部分，我打算提纲挈领地勾画出赋予布迪厄的事业以整体的统一性和敏锐的洞察力的基本原理和中心主张。需要预先指出的是：基于一种拒绝将主体与客体、意图和原因、物质属性和符号表象割裂开的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布迪厄力图克服那种将社会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强调认知形式的建

构主义现象学 (constructivist phenomenology) 的企图,他认为这些化约只会使社会学丧失活力。他本人则采用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 (genetic structuralism)。布迪厄不是通过形成一套严格限定的理论,而是通过系统地发展一种社会学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这一方法主要包括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一套十分简明的概念工具,建构研究对象的程序以及将在一个研究领域中业已发现的知识转用到另一个领域的程序。^[6] 尽管 (某个) 研究的特定对象十分重要,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应用于这一对象的方法重要,而且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无限多的不同对象”(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82:50)^[7],因为它被深深地植根于那种持久存在并能够转化的科学惯习的结构之中。^[8]

这里首先有两点要预先说明,以防误解。第一,在布迪厄的著作和下面我们对他理论要采取的“照相式”的静态说明方式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至少是一种强烈的张力。布迪厄的著作始终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随着他循环往复的螺旋式思维在时间和分析空间中的展开,他不停地修正自己的理论,并不断回到那些棘手的问题、对象和区域 (sites) 重新处理它们。^[9] 但我们在下文使用的线性的诠释方法,则由于它对于那些对应于布迪厄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并因此显示出其不尽相同的理论精致程度的阐述进行了人为的共时性处理,而有可能“冻结”布迪厄思想历程中那种螺旋演变的运动过程。虽然布迪厄思想的主要意图和力图解决的问题早在 60 年代中期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下来了,但自那时以来,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变动、转向和断裂。而在本书中,由于我们对其理论结构内在动力机制的淡化处理,所以这些变动、转向和断裂也将在某种意义上被忽略。^[10]

第二，无论设想在布迪厄和英美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人物之间存在对立、类似还是传承关系，都可能在无意之间助长那种对布迪厄著作作出草率结论或化约式的解读方法，而这往往不利于布迪厄的理论精确无误地传入英语世界（参见 Wacquant 1992）在跨越民族场域的边界，“译介”思想成果的过程中，牵涉到熟识与生疏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对此一关系的处理，往往要冒一些风险。在牵强的同化和富有启发性的类比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一方面要在文字上做到清晰可读，另一方面又须忠实准确地传达其形式、内容和学术谱系，这二者之间的两相权衡是十分微妙的。在原则上，我更倾向于前者，并相信读者会始终牢记：布迪厄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科学实践的实际运动，而不在于一个诠释者——不论他多么知识渊博、多么富有技巧——对他的理论所作的共时性说明。

第一节 超越社会物理学 与社会现象学的对立

在布迪厄看来（Bourdieu 1989a: 7），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这一宇宙十分独特，形象地说，它的各种结构就像“过着一种双重生活”^{〔11〕}，以两种方式存

在着：首先是存在于“初级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first order）^①中，其次是存在于“次级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second order）之中。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用布迪厄的术语说，就是各种资本的类型）的手段；而次级客观性则体现为各种分类（classification）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社会事实是对象，但也是存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知识的对象，这是因为世界塑造了人类，人类也给这个世界塑造了意义。^{〔12〕}

因此，若将这种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解为一个二维的“关系体系，既包括各群体或阶级间的权力关系，也包括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13〕}，就必然产生一种双重解读（double reading）。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科学体系必须设计出一套“双焦解析透镜”既吸取每种解读的长处，又避免每种解读的毛病。第一种解读用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的方式透视社会：它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无视居处于其间的人们的各自看法而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这一立场是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始作俑者即涂尔干的《自杀论》，后在法国出现了许多效法者，而在布迪厄开始构建其理

① 在布迪厄的作品中，object 往往兼有“客观”与“对象”之义，在本书中，我们往往根据上下文，斟酌处理。但读者应注意，布迪厄反对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因此 object 及我们所译的“客观”或“客体”都没有传统客体主义的强烈实体主义的意涵，而带有浓厚的关系主义色彩。——译注

论的核心命题时，结构主义的效法者中有了索绪尔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稍次之还有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它有力地破除了“社会世界透明性的幻觉”(illusions of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social world)^[14]，并与常识理解划清了界限。这样，这种立场便有能力发现男女众生在“生产他们的社会存在”时不得不涉入的“决定关系”(马克思语)，借助统计学、民族志描述或形态学等方法，外在的观测者可以对“未成文的音乐总谱”进行破译和解释，“但正是根据这一未成文的音乐总谱，行动者们（他们每个人都确信自己在演奏自己的旋律）的行动被组织起来”(Bourdieu 1980b:89)从而观测者还可以确定这些行动者所遵从的那些客观规律。

这种客观主义立场的主要危险在于：由于它未能考虑这些规律生成方面的原则，所以就容易从模式滑向现实。这就是说，它将自己构建的各种结构看作自主实体，赋予它像真实的行动者那样“行为”的能力，从而使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reify)了。客观主义只能消极地把握实践，最多只能用“学究”式的对实践的思考来替代行动者的立场，而这只不过是对分析者建构的模式的操作而已。客观主义这样做的确有些矛盾，因为他们方法上已先将行动者对实践所具有的经验搁置一旁，因此只能去揭示那种“学究”的实践观。^[15]从而，就在它赖以捕捉到它宣称要把握的现实的那个运动的过程中，它也正在破坏着这一现实的某部分。客观主义充其量也只能产生一个代用的主体，将个人或群体看成被动消极的承受者，支撑着机械地展开它们的自在逻辑的那些力量。

一种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科学，要想避免陷入这一化约论的陷阱，就必须认识到行动者的意识和阐释是社会世界完整现

实的一个基本要素。社会确实具有一个客观的结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 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用叔本华那句名言来说——“表象和意志”构成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每个人对世界都有一种实践知识 (practical knowledge) 并且都将它运用于他们的日常活动之中。“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完整的人类学不能仅限于建构客观关系，因为有关意义的体验是体验的总体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Bourdieu et al, 1965:20)。^[16]

另一种立场是关注“次级客观性”的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体现了这一立场的极端形式，而当下则在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① 的文化主义流派中和在一些理性主义色彩较浓的理性选择理论分支中，最为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立场。与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正相反，它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Garfinkel 1967:11)。在这种社会现象学的透镜里，个人机警自觉，社会就像是这些个人的决策、行动和认知中涌现出来的产物；而世界对于这些个人来讲，

① 此词国内一般译作“民族学方法论”、“民俗学方法论”或“本土方法论”这些译法的根据主要在于 ethno 是民族学的词根。但根据发明此词的加芬克尔本人的解释，ethno 是指 everyone 即普通人，平常人，与吉登斯常用的 layman 同义；而 method 是普通人的方法，即常人方法，而不是与 -ology 连读指方法论 (methodology)。因此，ethnomethodology 是指“the study of everyone's method”，即对常人方法的研究，所以译作“常人方法学”较为恰当，既区别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各种民族学科，也区别于一般所说的方法论。——译注

又是那么亲切熟悉，饱含意义。这种立场的长处在于，它认识到了在社会持续不断的生产过程中，那些世俗的知识、主观的意义和实践的能力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它强调了能动作用，还强调了“社会认可的类型化与相关性的体系”的重要作用。正是透过这一体系，人们才赋予他们的“生活世界”以意义（Schutz 1970）。

但在布迪厄看来，一种未经重构的社会生活现象学，至少存有两大问题。首先，它将社会结构理解为只是个人策略和分类行为的聚合^[17]，从而无法说明社会结构的韧性，亦无法说明这些策略所维系的或是加以挑战的那些自然而客观的构型（configuration）。其次，这种社会边际主义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本身得以被生产的缘由及其所遵循的原则。“如果是为了反对某些机械论的行动观，有必要重新提请人们注意，社会行动者是同时作为个人和集体，建构着社会现实，那么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我们不能忘记行动者并没有建构那些他们在其建构活动中所运用的范畴，而这一点正是互动论者和常人方法学家所经常忽视的”（Bourdieu 1989a:47）。

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既必须屏弃那种将行动者“打发去度假”的机械结构主义，又必须杜绝目的论个人主义。那种目的论个人主义要么用掐头去尾的“过度社会化了的‘文化傀儡’（cultural dope）”^[18]的形式来认识人们，要么用多少有些改头换面、精心装扮却仍表现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方式来认识人们。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和个人能动性，这些对立都是虚幻的，每一组对立中的双方都彼此强化。这些对立混杂在一起，掩盖了人类实践的人类学真相。^[19]为了超越这些二元对立，布迪厄将那些构成表面截然

对立的范式所依凭的“世界假设”(world hypothesis)(Pepper 1942), 转变成了一种旨在重新把握社会世界双重现实本质的分析方式中的一系列环节(moments)。由此产生的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xeology)^[20]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21]首先, 我们将世俗表象搁置一旁, 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正是这种社会有效资源的状况规定了加诸互动和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 我们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 以揭示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 尽管上述两个分析环节缺一不可, 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等: 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运用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首要原则, 亦即系统地屏弃各种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22], 必须是在从主观立场上对世界作实践领悟的分析之前。原因就在于, 行动者的观点会随其在客观的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的不同而发生根本的变化(Bourdieu 1984a, 1989e)。^[23]

第二节 分类体系的斗争以及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辩证关系

一门名副其实的探讨人类实践的科学, 不能够只是满足于仅仅在一种社会结构学上再叠加一种社会现象学。同时, 这门科学还必须阐明行动者在其日常生活中运用的知觉图式和评

估图式。这些图式（各种情境定义、类型、阐释程序）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又是如何与社会的表层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呢？正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确定布迪厄社会学基本思路的第二个基本假设（Bourdieu 1989a: 7）：

在社会结构与心智^①结构之间，在对社会世界的各种客观划分——尤其是在各种场域里划分成支配的和被支配的——与行动者适用于社会世界的看法及划分的原则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这当然是对涂尔干和莫斯提出的独创性思想重新进行的系统阐述和概括，而这个观念则是涂尔干和莫斯（Durkheim and Mauss 1963）于 1903 年在他们俩的经典研究《分类的某些原始形式》中阐述的。在那篇文章中，《社会学年鉴》的创始人涂尔干和他的侄子莫斯提出，原始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认知体系就是这些原始社会的社会体系的派生物：理解范畴就是集体表象，而根本性的心智图式则是按照群体的社会结构调整定型的。布迪厄则从四个方面入手，扩展了涂尔干这一关于思维体系的“社会中心论”（sociocentrism）的命题。

首先，他认为在传统社会共同体中观察到的认知结构与社

① mental，在近来的历史学和一些社会理论中往往译为“心态”。但与侧重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化形式及普通人观念行为的所谓心态史学不同的是，布迪厄继承涂尔干的传统，强调分类体系的重要性，而非文化史学意义上的情感和态度，所以我们译为“心智”。——译注

会结构间的对应关系 也存在于发达先进的社会中 而发达社会中的这种对应关系大部分是通过学校体系的职能生产出来的 (Bourdieu 1967a)。^[24]

其次，涂尔干和莫斯理论中的有些地方未能就分类图式的社会决定机制作出合理的因果分析 (Needham 1963: xxiv) ,然而布迪厄却提出，由于社会划分和心智图式在生成方面就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心智图式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划分的体现。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社会状况（这种接触的结果也因此日积月累），个人也就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也可转换，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惯性及外在现实的约束的烙印。如果说，具有次级客观性的结构（即惯习）就是具有初级客观性的结构在身体层面的体现，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对客观结构的分析将扩展到对主观性情倾向的分析，从而消解了一般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设置的虚假对立” (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82: 47)。^[25] 一门关于社会的充分完整的科学，必须既包括客观常规，又包括这种客观性的内化过程。正是经由这种内化过程，行动者在其实践中注入的各种超个人的、无意识的关注原则或划分原则 得以构建。

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布迪厄认为，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间的对应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还是支配的工具（在马克思那里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在韦伯那里是神正论）。作为认知整合的运作者，它

① Principles of (di) vision。作者在这里注意到了 vision(眼光、关注)和 division(划分)的词根联系。——译注

们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推动了那种对任意武断的秩序的社会整合：“社会秩序的维持在极大程度上是由……有关社会世界的各种知觉范畴的协调结合所保障的。由于这些知觉范畴是根据既定秩序的各种划分（从而也就是根据那些支配者的利益）作出调整的，并为所有按照这些结构而构成的心智所共有，所以它们把各种客观必要条件的表象加诸自身。”（Bourdieu 1984a:471 英译文有所改动 又见 1971b）这些社会构建的分类图式正是我们借以主动地建构社会的依据，它们往往会体现出相应的结构；透过这些结构，这些分类图式才得以呈现为自然的和必要的，而不是历史偶然的产物 即各阶级“种族”群体或性别间特定权力平衡的结果。^[26]但是，倘若我们承认符号系统是能对构造世界发挥作用的社会产物，即它们不只是照样反映社会关系，还有助于构建这些关系，那么，人们就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通过改变世界的表象来改变这个世界（Bourdieu 1980g, 1981a）。

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各种分类系统构成了争夺的焦点，各个个人和群体为此而在日常生活的常规互动中、在发生于政治和文化生产的场域中的单打独斗或集体竞争中相互对立。这正是布迪厄与涂尔干的问题域分道扬镳的第四个方面。在阶级区分的社会中，将各个群体的表象组织在一起的社会分类体系（例如职业量表或工资量表），“每时每刻都由阶级间的权力关系生产出来，并处于争夺的焦点”（Bourdieu and Boltanski 1981: 149，英译文有所改动）。

就此，布迪厄用一种有关分类体系的形成、筛选和强加于人的发生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补充完善了涂尔干的结构分析。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具有结构性的关联，并彼此强化。两者间达成的对应关系为社会支配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之一。各个阶

级和其他各种敌对的社会集合体，持续不断地参与这场有关分类体系的争夺，以便强加那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其特殊利益的对世界的界定。知识社会学或文化形式的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社会学，亦即一种符号权力的社会学。的确，布迪厄的全部学说可以被理解成一门唯物主义人类学，这种唯物主义人类学探讨符号暴力的各种形式如何发挥特有的作用，影响支配结构的再生产及其转换。

第三节 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

所有方法论上的一元论，都声称要确立要么结构要么能动者(agent)，^①要么系统要么行动者、要么集合体要么个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与这些方法论的一元论不同，布迪厄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上述这类二元论式的抉择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常识性观念，这正是社会学必须从自身中祛除的。这种常识性观念植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本身，而它则“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Bourdieu 1982a: 35)。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978a:113)是另一位有关社会现

① 有关 agent 与 actor (一般译作行动者)的细微差别，参见下文第二部分第三节[3.7]及相应段落的译注。这里将 agent 译作“能动者”是考虑到华康德在行文中暗指其他理论家用这个词强调人的能动作用(agency)，与结构的外在约束力量相对。——译注

实的关系性概念的坚定倡导者。他坚持认为，日常语言致使我们“在行动者与他的行动、结构与过程或者对象与关系之间，作出不自觉的概念区分”，其结果是妨碍我们把握社会中相互交织的复杂联系的逻辑。^[27]社会学家总是在有关社会世界的表象方面与其他专家——尤其是那些政治家和传媒专家——一争高下，而那些专家又总能从这类常识思考中获得既得利益。这一事实更增强了语言所具有的那种突出实体、牺牲关系的倾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以及转换成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的对立）是那些危害社会学的“毒瘤般的主张”之一。这些预设之所以对社会学有害，是因为它们是不断地由各种政治对立和社会对立所激发的（Bourdieu 1989f）。社会科学并无必要在这些极端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布迪厄据此既抛弃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又拒斥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以“方法论上的情境主义”（methodological situationalism）形式出现的对二者的虚假超越。^[28]构成他的社会学立场核心的关系视角并不新颖，而是一种广泛的、“源出多门且形态各异”的结构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涂尔干和马克思（Merton 1975:32）并于战后在皮亚杰、雅各布森（Jacobson）、列维-斯特劳斯和布罗代尔（Braudel）等人的著述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29]也许正是卡尔·马克思最简明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71:77）中写道：“社会并不只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30]布迪厄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持之以恒地热心推广这一观念。这可

以拿他的两个关键观念惯习和场域（它们都指一些关系束）作为例证。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同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曼(Michael Mann)、蒂利(Charles Tilly)一样，布迪厄也戳穿了“社会”这一观念的空泛本质，并代之以场域和社会空间的观念。在布迪厄看来，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不管这种逻辑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的。与韦伯所论述的“生活秩序”(Lebensordnungen)很相像，社会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里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的生活秩序(Gerth and Mills 1946:331-359)。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这一简要定义有两个关键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其方式很像磁场），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场域就好比一个棱镜，根据内在的结构反映外在的各种力量：

场域内产生的各种效应，既不是杂乱无章的行动的纯